

勾勒出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历史主义回归之轨迹。

文学理论的“回归”路途

■颜翔林

伽达默尔曾提出“理论生活”的概念,这位百岁老耆以其生命历程亲证了存在主体除了世俗生活之外,人还有“理论生活”的形而上学的高等需求。姚文放先生几十年来沉醉于美学与文学的“理论生活”,数百万字洋洋洒洒的撰述形成了自我风格的“理论癖”。近期,作者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出版。

文学理论的运行轨迹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形式主义占据主流。自俄国形式主义发轫,将语言形式的“陌生化”视为文学之为文学的准绳,并将“文学性”归纳为不断延续的语言形式创新问题,从而为文学的本体论研究拓展了新思路。尔后的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接受主义文论、解构主义文论等基本上遵循这一路径。然而,时至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气象革新,风云变幻,出现向历史主义的回归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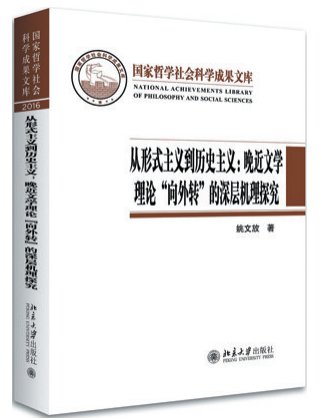
流。诸如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文学理论思潮各领风骚。这些从观念到方法均存在差异与交互的文学理论对国内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影响。文放先生新著以历史与逻辑交叉渗透的一般方法论,以中西互证、古今参照、关切当下的理论视野,对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予以描述与分析、考察与阐释,作者凭借深邃通透的思辨眼光和敏锐空灵的直觉感悟将文学理论与艺术现象或审美现象达到理性综合,从而获得自我的理论自觉,精湛地勾勒出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历史主义回归之轨迹。

该著呈现出鲜明而重要的学术特色之一,即是理论上的问题意识和逻辑上的自律自洽性。作者主要关注与探究了这些问题:首先,作者紧密关切“文学性变异”问题,以此作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轴心,

为对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观念演变进行梳理奠定了学理基础。其次,“理论之转向”构成作者思考的另一个焦点。作者诠释了“理论”这一概念和内涵与外延及其历史运作模式,并且和文学理论实行了逻辑与历史的深刻关联。再次,对文化政治这一概念,该著进行了广泛的学理探讨,阐述其与消费、娱乐、享受、欲望与性的相结合的复杂性,由此论证由于文化政治这一概念的介入,晚近以来的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后现代意义的历史辗转。第四,围绕着“文学经典”,这一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作者展开概念阐释与历史描述相统一的论证,作者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具有价值二重性,但是一旦将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考量,便不难见出文学经典建构的两种价值取向往往是不对等、不平衡的。因此,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概念,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审美的、艺术的

基本价值取向与功利的、实用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两极。文学经典就像钟摆,它总是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第五,“话语理论”是文学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命题,作者由福柯的话语理论切入,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提升传统的“表征”理论,为考量文学的基本问题展现了新的视野,从而在逻辑上肯定了构成主义表征理论作为第三条道路来帮助文学理论开拓新的生存空间成为可能。第六,理论的“批判”性是该著的又一抹思想亮色。作者以“批判”话语的谱系学研究,获得自我的运思之途,在哲学“批判”与文学理论之间搭起一座徜徉的桥梁。该著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作为逻辑基石,清理了黑格尔的“反思性批判”与“否定的辩证法”,再到论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作为社会变革的利器,接着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大众文化批判”的思想内涵,再到反思20世纪中国的“批判”话语的政治

化转向与学理性回归,最后展望了21世纪大众文化批判的话语重建,由此形成了一个逻辑与历史紧密相扣的理论链条,而哲学意义的反思性批判和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批判成为这一“批判”的主旨与灵魂,也远远超越以往文学理论上的单纯政治化和狭隘价值论的“批判”。第七,美学与文学理论的密切关联是一个显要现象。晚近文学理论的“向外转”趋势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不可能没有哲学、美学的呼应与共鸣,也不可能没有哲学、美学的观念与方法的支撑。作者通过对丰富复杂的理论现象和文化现象、审美现象的考察与分析,从而指出,后现代与审美文化的历史性遇合为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也为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拓展提供了良机。第八,理论生活一方面呈现对历史的超越性和概念的纯粹性,另一方面,理论生活总是承担着面对现实和回答当下提问的崇高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姚文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定价86元

责任。最后,从这个意义来说,将文学理论的宗旨和回归之途落脚至“中国问题”显然就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逻辑结果。作者指出,我们对上述每一个理论的研究,最终都归结到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的文学问题、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显然,作者这一著述自始至终地立足于中国问题和国意识,以理论思考回答现实的提问和挑战。

对读书、工作和生活的知行灵感融于笔端,化成文章。

心里有束光,眼前有片海

■周溯源

曹魏开国皇帝曹丕有句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可以说将文章的作用提到了极致。更早的《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高度重视写文章。周发源先生向往和践行“耕读持家”的文化传统,勤于读写,把对读书、工作和生活的知行灵感融于笔端,化成文章。《源道》一书就是选自他多年来创作的几百万字文章。全书共四卷:第一卷包括理论文章26篇,第二卷包括调研报告10个,第三卷包括讲话发言42篇,第四卷包括随笔短文72篇。是作者从100多篇已刊发的理论文章、近30个调研报告、200多次讲话发言以及200多篇各类随笔散文中遴选出来的。这套书凝聚了作者30多年的心血汗水,有许多独到之处。

由于时代所限,作者的正规学校教育不系统,曾经下农村、学手艺、闯社会、进工厂闹团,仅是凭借着从小

对读书写作的分外喜爱和心中怀揣的梦想,坚持着各类作品的创作。截至目前,出版专著2部,主编著作20多部,在《求是》发表理论文章5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13篇,15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以上级别的奖励,被多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其学术业绩得到社会认可。从较低的起点出发,能够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学者并不多见,堪称草根底层成功逆袭的范例。在如今崇尚高学历和海外留学的时代里,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获得学历文凭或者继续深造的青年人来说,这种榜样值得学习。周发源的成功证明了一个道理:只要拥有梦想,始终坚持做自己最喜爱的事情,久久为功,终有所成。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人是有点精神的。不管岗位、年龄如何变化,只要一息尚存,就应有所追求、有所奉献、有所作为,为国家、为人民、为自己。”对困惑迷茫、信仰迷失、精神懈怠、及时行乐

的部分当代年轻人来说,这些话宛如一股清醒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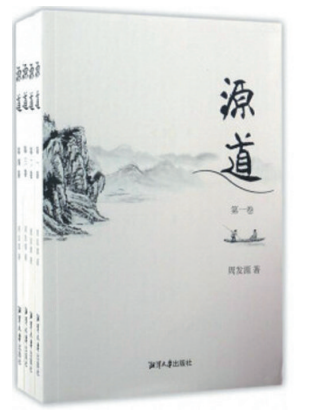
乱世出英雄,盛世出华章。盛世是和谐、理性、科学的时代,盛世的人们自然会发现社会生活多方面的的美好,容易创作出反映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的作品。《源道》第四卷收入的散文、随感贴近现实,既有对自然与社会的歌颂与赞美,也有对人生的感悟与反思;既有对自己情感心声的抒怀,也有对青年同志关于工作、学习、生活的交心谈心,述说着励志故事,让人感到亲切真诚。收入的书评、序书既有对优秀作品的推介,也有对作者人格力量的品读。收入的短论既有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学理探讨,也有对特定社会现象、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深刻剖析。这些作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透过它们,读者能看到作者的生活与情感经历。阅读这些作品,能得到慰藉和启迪。

俯古观今,“文章合为时而著”,文章与时代发展休戚相关,好文章必然是时代的产物,是事业的需要,是实践的结晶。一个人的思想,就是对世间的观察感悟而来的所思所想,是在对人类文明遗产继承借鉴与在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作者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后所写的理论文章,大多是围绕着当时的大问题展开的,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时代痕迹,如对邓小平决策思想的研究,对官僚主义的研究,都是着眼于当时的理论热点问题,走在学术前沿进行思考研究的。开展实地调研,解决现实问题是作者后期研究的主要方向。作者注重选择当时的热点难点问题、紧扣实际实践,深入探讨分析,然后提出政策建议,体现了责任感,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

无论古今中外,文章都被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摆在重要位置,帮助执政者延伸治理领域、提升治理能力,打造“纸上江山”。《源道》第三

卷收入发言讲稿42篇,涉及中心组学习会、学会年会、学术年会、学术研讨会等各类会议,有的是学习贯彻上级精神,有的是谋划部署工作任务;有的是工作报告,有的是专题讲座,有的是座谈交流,有的侧重做事,有的注重为人,是作者担任湖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期间对全省社会科学工作的思考谋划,是出台政策举措的思想基础,是推进各项工作的思路方法。

《源道》第二卷收入调研报告10个,这些调研报告问题导向鲜明,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对策性和可操作性,有的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领导人的肯定批示,为政府作出决策、制定政策提供了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较好地发挥了智库作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些文章或者阐释政策、统一思想,或者分析矛盾、探究问题,或者弘扬精神、鼓舞士气,都是作者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形成



《源道》(全四册),周发源著,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定价169元

的文稿,具有大局意识、前瞻性和针对性,兼具学术和实用价值。

读书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是读书的深化,写作能把零散的东西变成系统的,把孤立的的东西变成联系的,把粗浅的东西变成精深的,把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正如作者所言:将以甲子轮回为新起点,学无止境、研不懈、写不停,开启自己的“第二春”。笔者衷心希望先生心中那束希望之光永远闪耀,眼前那片思想之海不断拓展,在治学路上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发展时代中国村庄的部分缩影。

乡村写作的尴尬:“在乡”的与“回不去”的

■周红莉

自鲁迅开启中国现代文学的“归乡”模式以来,“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身体与心理、现实与幻景的纠葛状态似乎成为乡村写作的惯性存在。当代“寻根文学”中也有“怀乡”和“怨乡”的复杂情感,大抵是“农裔城籍”类作家身处之地与心居之所剥离状态的扭结。这些颇具意味的“逆城市化”文学倾向,极大拓展了乡村叙述的张力,也催生了一些真诚、疼痛、善意的作品。周荣池和他的散文集《村庄的真相》就是一例。

周荣池是在离开村庄多年后开始“回望”乡村的,这种置身事外的回望与反思更加的热切也更加清晰。他说写作的责任是发现生活的苦难,并且尽自己所能去缓解这些疼痛,这是乡土写作最现实的意义。他希望在乡土中找到写作的价值与意义。尽管那种弥漫着生活苦

痛的里下河土地曾是周荣池一直想拼命摆脱的背影,但他依旧“在城里凝望乡村的月光”,用“善意”拥抱疾苦,对给予他养育之恩的里下河风情、风貌、风物以及那里熬活的人们投去深情一瞥。

事实上,“在乡”写作理念早就深植在周荣池创作中。已经出版的散文集《草木故园》和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都是以“里下河土地”为话语中心。前者纪实乡村,后者想象乡村。那么,作为《草木故园》的姊妹篇《村庄的真相》(都起源于系列散文“诗经中的里下河”)是如何具象化展览“在乡”现场,又是如何叩问“村庄真相”的呢?这些“村庄真相”是周荣池的“自为之书”还是村庄全景式客观图景?是村庄现场的真实物事还是关于村庄的“情感真实”?还有,坚守“在乡”写作的周荣

池能回到他的村庄现场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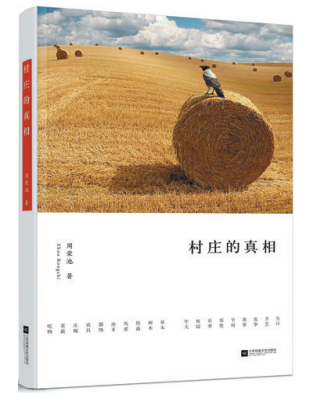
村庄伦理是周荣池还原村庄的精神真相。被“开发”前的村庄几乎是静止的历史,村庄人的生存法则、乡村的道德伦理大都与善恶有果的“宿命”相关;节制和风俗作为村庄人的信仰,成为维系村庄日常秩序的恒定方式。巨大的村庄“在场感”在周荣池笔下荡漾着,拉拉杂杂的琐碎都是周荣池经历的选择,是他写作的母体和活水,也组成了他关于村庄记忆的博大信息库。马尔克斯在回忆录《为小说而生》开篇写道:“生活并不是我们的当下,而是一个人所记得的,以及一个人是如何为了讲述它而去记得的”;周荣池说:“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在用文字建立虚拟而又真实的村庄史标本。”这是作家的“自为之书”,也是村庄客观图景的主观性表达。

“回不去”是周荣池隐藏在纸本

中的另一个讯息。作为城市的“亚类属”人群,周荣池的“种”是村庄的血脉中有着农人的基因;“属”是城市的,在城市生活、工作,浸润着城市的气息,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便利与安逸。周荣池一再宣称,“回去有时候非常艰难”,村庄的“日子把人穷怕了”,“饥饿甚至比死亡更为可怕,所谓的“尊严”“爱情”在贫瘠中可以随时撒手,所谓的“美丽”“诗意”在熬活的人们那里微不足道,“吃饱了”“实用”是村庄里最根本的生存真相,“苦尽甘来”是村庄生生存真相的最高信仰……周荣池是诚实的,在物质匮乏中滞留太久,是懦弱的,能力上是残缺的,女性的独立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狂流》中三个女性对于婚恋无可无不可的泰然与淡然,极为和谐的熔铸在一起。这些北大学子,对独立精神与个性观念深谙于心。对自我、人性与独特性都内化于自身。她们率先走出国门,亲临其境,体验不同文化景观与思想内容。她们不需要为争取自我权利而呐喊,不需要为如何抉择而彷徨,不需要为某个决定内心充满纠结,不

需要为舆论承受压力。在她们看来,似乎人生本应如此。一种超然自适的伦理理念与日常行为已浑然一体,不需要辩解,不需要阐释。因为没有恨与怨,也就没有冲突。整部小说的格调是和谐、平缓的;即使是周鸿飞的妻子庄晓岩知道了丈夫和林晚的事,包括还有一个女儿,也没有大的波澜。晓岩只是在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然后潜意识地买了一处房子,也许有一天自己能用到。这显然是优雅知性独立姿态的呈现。而且,这种和谐平缓的格调涉及到了三代人。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可以发现,作者的审美聚焦正是对于婚恋独立的伦理关怀。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世俗步骤,在《狂流》已经消失殆尽。内地女作家也有很多



《村庄的真相》,周荣池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版,定价48元

发展时代中国村庄的部分缩影。

无论是主观的意愿还是客观的现实,“回不去”村庄已是周荣池或是周荣池们的主体必然,也是历史使然。村庄,那个原本承载着痛苦记忆的地方,也许,在历经年数、距离、人世的沉浮后,会像鲁迅记忆中反复“美化”成“极其鲜美可口”的蔬果,也要哄骗周荣池们一生,使他们时时时回顾沼泽笔端了。

女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与婚恋价值观的新变问题。

僭越传统婚恋伦理的“独立”寓言

■刘红英

《狂流》以平缓的叙事风格,讲述三位女性求学工作、出国移民、恋爱结婚等人生遭际。她们都是北大优秀学子,得天独厚的资质与学养为她们进入社会后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她们的生活不存在衣食之忧,即使出国打拼,也属于马斯洛所言“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小说引发的思考是在现代社会中,当物质富足以后,女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与婚恋价值观的新变问题。作者从情爱伦理以及女性自我关怀的视角,对主人公婚恋观予以敏感的思考,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伦理关怀与女性“独立”的思考。

《狂流》的深层结构是从突破传统婚恋道德的禁忌展开的,而且,这种突破没有我们惯常思维中“繁漪”

式的争执与撕咬。此处波澜不惊,但这正是《狂流》让人感受到的震撼体验之一。怡敏、林晚和海婷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她们风华正茂,是北京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她们住在同一宿舍,各自遭遇了不同的爱情故事,都选择了无怨无悔地做“单亲妈妈”。

这部小说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趣和价值关怀也恰恰体现在这里,堪称“女性独立”的最新模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作家敏锐地意识到知识女性取得世俗成功之后,所面临的婚恋困境。无论是张洁的《方舟》,还是徐坤的《厨房》,都在反思女性经济乃至于精神独立后,在取得耀眼光环后凸显的“单身问题”。现代女性一旦参与以男性社会为主导的游戏规则,不仅改变

的是女性自身的性别异化,而且给女性带来的更大的痛苦。传统女性对现代女性的性别差异问题,女性如何能够完成妻性、母性的历史任务,从而获得婚姻的幸福,成为作家不断在反思的社会问题。换言之,各自遭遇了不同的爱情故事,都选择了无怨无悔地做“单亲妈妈”。

在世俗伦理还不能完全认可“单亲”的家庭模式下,《狂流》做了理想的尝试。在男性缺席的家庭

中,女性轻松地独自承担着所有的家庭负担。可以说,她们已经完全实现了经济的独立,同时也实现了精神的富足。与这些自足的女性相比,相反那些有男性的家庭,往往充满了纷争,甚至男性在性格上是懦弱的,能力上是残缺的,女性的独立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狂流》中三个女性对于婚恋无可无不可的泰然与淡然,极为和谐的熔铸在一起。这些北大学子,对独立精神与个性观念深谙于心。对自我、人性与独特性都内化于自身。她们率先走出国门,亲临其境,体验不同文化景观与思想内容。她们不需要为争取自我权利而呐喊,不需要为如何抉择而彷徨,不需要为某个决定内心充满纠结,不

需要为舆论承受压力。在她们看来,似乎人生本应如此。一种超然自适的伦理理念与日常行为已浑然一体,不需要辩解,不需要阐释。因为没有恨与怨,也就没有冲突。整部小说的格调是和谐、平缓的;即使是周鸿飞的妻子庄晓岩知道了丈夫和林晚的事,包括还有一个女儿,也没有大的波澜。晓岩只是在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然后潜意识地买了一处房子,也许有一天自己能用到。这显然是优雅知性独立姿态的呈现。而且,这种和谐平缓的格调涉及到了三代人。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可以发现,作者的审美聚焦正是对于婚恋独立的伦理关怀。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世俗步骤,在《狂流》已经消失殆尽。内地女作家也有很多



《狂流》,二湘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定价39元

表达对传统伦理的颠覆,但是始终不能将新的伦理观践履于审美叙事。不过,该部小说以其独特伦理叙事中也透露出一些现实隐忧。如果女性真正达到了如此的“独立”,是否面临着传统婚恋道德的解体?这种独立是道德和人性的贫瘠,还是自主与独立的丰腴?是应该获得崇高的礼赞还是应该批判性的反思?我以为这部小说的一些结果暗含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虑。